

◎对话学人

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深,更令人难以想象。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

怎样应对网络霸凌

——访台湾政治大学周祝瑛教授

本报记者 杨桂青

18岁澳大利亚网红女孩声称放弃万千粉丝追捧退出虚拟世界,儒家文化圈青少年网络霸凌现象有何特征?在最新出版的《网络效应与青少年教育》一书中,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响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霸凌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成长。近日,我们就如何应对网络霸凌采访了周祝瑛教授。

网络霸凌背后隐藏着哪些成长的“秘密”

记者:请您谈谈什么叫网络霸凌?

周祝瑛:网络霸凌主要指使用网络散布谣言,留下辱骂或嘲笑的字眼,造成被霸凌者身心受挫等伤害,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自杀,可见问题相当严重。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网络霸凌?网络霸凌折射了哪些社会问题?

周祝瑛:这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大欺小、强凌弱的情况一样,尤其在网络世界人们隐居于匿名的保护伞下,许多人的胆子变大了,加上言论不必负责,便认为可以无所顾忌,不受约束。于是只要机会来到,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无限制的攻击与霸凌,把平常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说与不敢做的事,甚至是压抑的情绪,通通释放出来。结果造成对于受霸凌者的伤害,往往不可收拾。

至于校园霸凌,经常是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学校学生与学生间,个体或集体持续以言语、文字、图画、符号、肢体动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贬抑、排挤、欺压、骚扰或戏弄他人,使他人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或难以抗拒,产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财产上的损害,或影响正常学习活动。

挪威心理学教授艾文斯依照霸凌手段与方式的不同,将霸凌分为关系霸凌、言语霸凌、肢体霸凌、性霸凌、反击型霸凌和网络霸凌等六大类。其中的网络霸凌,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校园霸凌已经突破了过去我们在校园里能直接看到的肢体或语言上的霸凌。在网络世界中,一种凭借网络媒体、潜入校园内甚至蔓延至校园外的霸凌行为,更具伤害性和隐秘性。其传播之广、伤害之

◎先见之思

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教育系统的逐步完善和教育功能的多元化,持续教育在整个澳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持续进修发展计划也顺应了居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持续进修和培训逐渐形成了一种学习型社会形态。

我们能从澳门持续进修发展计划学到什么

安雪慧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1年11月15日实施了《澳门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十年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回归教育标准考核机制,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实施回归教育;优化市民持续进修的各项条件;发展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以进一步形成学习型社会。

实施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2007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持续教育资助计划,为年满15周岁的澳门居民提供持续教育资助。2007年至2011年共举办了8期该计划。在前期试点探索和对资助计划评估基础上,澳门政府认为有必要继续增强持续教育发展,于2011年7月实施了第一阶段三年期的持续进修发展计划,年满15周岁居民可享受最高澳门币5000元的进修资助,鼓励和支持澳门居民接受教育与培训。由于第一阶段

深,更令人难以想象。记者:网络霸凌有哪些情况?分别应该如何解决?

周祝瑛:有些人将霸凌程度分为以下几个等级。轻度无心的网络霸凌,做出一些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玩笑举动,但自己可能毫无觉察。中度网络霸凌,经常做出危险、伤人的错误言行,且到达应该受管教和约束的程度。重度网络霸凌,重复且多次在网上做出各种伤害人的举动,造成对方隐私曝光,身心受挫与名誉受损,已有犯罪之虞,达到提告标准。

例如,两年前澳大利亚一个18岁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白视频《我并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我》,声称自己将退出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视频中她素颜出镜,和往常那个花枝招展、妆容精致的模特差别很大。她懊悔自己从16岁那年开始,每周花费50多个小时流连于网络,忙着发布照片,和网友互动等。那些经过不断设计和润色后的照片,引来无数粉丝留言称赞。然而这样光鲜的生活却让她觉得万分压抑,认定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个女孩有过网络成瘾问题。

记者:从实施网络霸凌的一方来看,他从这种霸凌行为中会获得哪些快感?

周祝瑛:以生物界的猫捉老鼠为例,猫有时抓到猎物后不会一下子将其弄死,而是慢慢地加以玩弄与凌迟,掠夺者在此过程中产生一种从旁观他人痛苦挣扎历程的乐趣,甚至生发出一种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生死的心感与成就感,进而可以自我肯定,建立自己很厉害的信心。可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变态心理,把自己的快乐加诸他人的痛苦之上,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成就感的愤怒与挫败情绪,甚至自卑、懦弱与挫折压力,通过网络霸凌他人,来换取个人的自信心与满足感,甚至在网络中建立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却造成他人身心的巨大伤害与名誉受损。这其实是很不道德的事,严重的甚至违反了法律,也应该遭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网络霸凌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记者:网络霸凌和网络成瘾

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周祝瑛: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柯志鸿医师认为,网络成瘾和我们大脑分泌的多巴胺(dopamine)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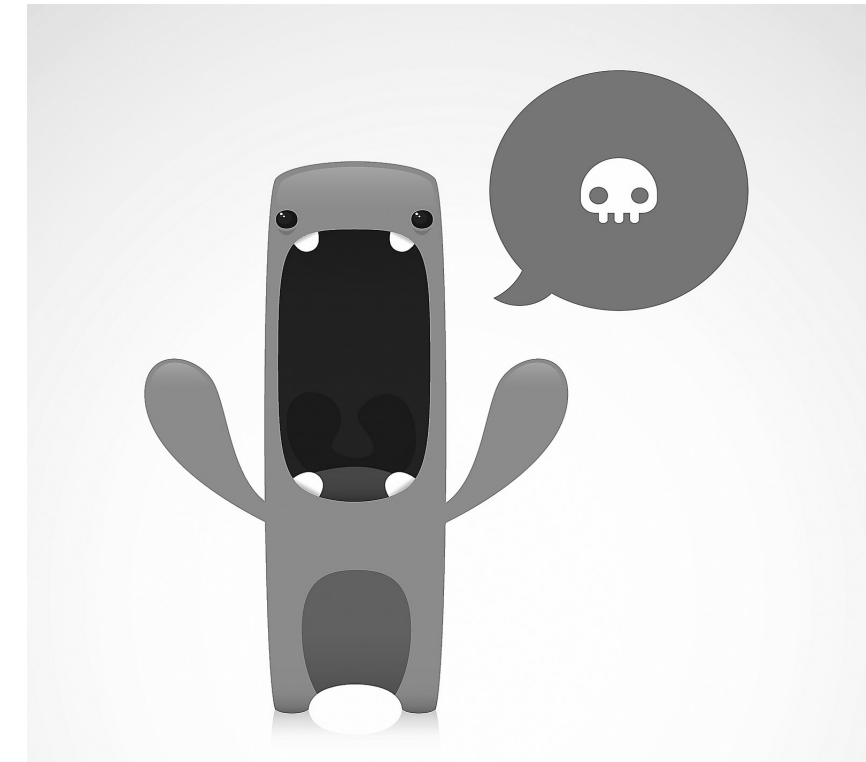
网络游戏世界,充分满足了网络成瘾者正向情绪的需要。当游戏者受到精彩的游戏动画、情节或声光效果刺激时,大脑会快速分泌多巴胺,使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得到提升。因此成瘾当事人在回忆网络游戏时,只会记得获得的快乐情绪。而作为神经传导物质的多巴胺能直接强化人类的情境感官功能,将游戏的正向情绪经验相互连接,有助于缓解真实社会带来的负面情绪。一旦游戏者将游戏视为失意时获得快乐的唯一途径,便不知不觉陷入网络成瘾。

针对网络成瘾症状,柯志鸿提出了台湾网络成瘾三方面的诊断准则。第一阶段,整天想着网上的活动,竭尽所能来获得上网的机会,不管自己有无控制力,只要上网才要休。第二阶段,已经影响自己的正常角色与日常生活,包括与家人相处、人际关系都发生改变,甚至出现违反法律或校规的行为。第三阶段,自己发现已经无法控制上网时间,不管家人或朋友的反对,自己就是要上网玩游戏。

虽然研究上尚未发现网络成瘾与网络霸凌有直接关联性,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青少年长时间在网上浏览,很在意网络社群的意见与信息,那就可能遇到对自己的发言,看不顺眼的,只要言语不合,很可能提高了自己被霸凌的风险。

记者:网络霸凌与地域文化有关吗?

周祝瑛:过去的校园霸凌事件,经常发生在日本中小学校园内,而后华人社会也逐渐发生类似校园霸凌事件。到了网络科技盛行之后,网络霸凌问题似乎更加普遍与严重,我常常在想,这是否与东亚文化有关?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要求应放在个人之上。尤其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强调积极求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充实自己,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像这种比较强调群体成就及成绩有关的社会,容易造

恐惧
CFP供图

成整体社会的群体压力,自我比较压抑,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在现实生活备受压抑下,到了网络世界便可以不受约束,甚至肆无忌惮地纵横其中,言论甚至因匿名而拥有免责权。

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对网络霸凌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如何消除中国校园中的手机控?

周祝瑛:我曾在马来西亚参观一所华人中学,发现这所六年制的独立中学,竟然全校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如果学生真的有需要使用手机,可以向学校借用,当然有所限制。其实这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优秀独立中学,学生的学习环境优质而多元,在外界看来却是一所追加的眼科研究专家预测,到2050年,世界将有半数人口(近50亿)会是近视眼,而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要属当前横扫全球的各样电子屏幕。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近视人口比例世界最高,且年龄逐渐降低,值得家长注意。

记者:网络、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它对于网络成瘾、网络霸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祝瑛:网络霸凌与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应该很难随着技术进步而消失。根据统计,日本目前

有50多万12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上网成瘾。许多医院开始成立戒网科,帮助父母协助解决青少年网瘾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计划成立网络戒断营,聘请专业人士协助上网成瘾的青少年。韩国18岁以下的学生中,则高达30%网络成瘾。尤其每天在大众捷运系统上,更有愈来愈多的年轻父母,因本身经常浏览网络世界或者本身就是网络成瘾者,除了自己是低头族外,也会塞给幼小孩童电动玩具与手机等,以安抚小孩,却不知不觉让孩子形成网瘾问题。

笔者曾经接到某个爸爸的来信,描述自己是个标准的手机控,早上睡醒就会先摸手机查看信息与把玩,上班路上遇到塞车、红灯,也会忍不住刷刷手机,在公司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奉献给手机。下班回家后就躺着玩手机直到睡觉。因为手机不离身,吸引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导致后很少和太太与小孩互动。一直到太太受不了,带着孩子离家出走,才发现自己的网络成瘾已经严重地影响夫妻生活与亲子关系了。这才下定决心不再做手机控。

(周祝瑛系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博士)

◎几勺思想

外国教育史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陈露茜、张斌贤、石佳丽在2017年第8期《高等教育研究》发表《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一文提出,教育史研究是感情细腻、色彩鲜明、情节丰富的,也是融汇了当时社会的风情、风貌和风格的,还是发自内心的被触动、被感动,抑或被震撼的。教育史的书写与阅读应该使作者与读者都共同继续沉浸在生动的历史之中,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起点。

整体而言,近年来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动态大致可归纳为:一是反思外国教育史学的本体价值,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目的、范式、逻辑、言说方式等系列主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二是进一步尝试走出教科书般的宏大叙事框架,在建构整体史观的同时,走进微观研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显著增强。三是美国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延续着一枝独秀的局面,并在其内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新题新做、旧题新做的现象。四是早先遇冷的职业教育史、教育思想史、学前教育史等主题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原有主题的边界与壁垒,制度与思想的两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开始渐渐消融、弥合。五是虽然中世纪大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细化,但外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整体而言仍较薄弱。

学者们对外国教育史研究本体的讨论涉及:外国教育史研究是什么;它的学科属性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该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在多元学科交融的知识母体中外国教育史研究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其他学科知识对其独立性的侵犯性,是否有必要对侵犯持忧虑态度等。

在今后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中,以下三组命题值得重视:一是求知与求用的关系,二是宏观理解与微观研究,三是外国研究与中国视野的关系。伴随着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飞速发展,经济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进入快车道,我们对外国教育的兴趣与需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中西方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以及他者优势说的驱动,在我国甚至出现了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为楷模(尤其是美国),力图按照其教育模式改革中国教育趋势。

要让外国教育史研究饱含中国视野或者中国特色,就要求研究者真正进入异域情境与语境,精细把握异域教育现象制度、实践、思想、观念、惯习等,进而发现真实的异域教育历史之情境。

(杨桂青 辑)

自由是一种内在的强制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丽华在2017年第4期《教育研究与实验》发表《用强制培养自由:康德的教育观》一文指出,在康德的哲学理念中,人是自由的,这是人之为人的自我规定。其中,自由之要义是不服从于外在的强制,只是且必须是服从于内在的、出自义务的强制,即自由与强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自由与强制之间存在张力,但也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教育就是按人的规定性对人加以养育、规训、培养与教化的过程,是一种自的的强制活动。学校教育的强制特征,不仅是教育目的的规定,也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基于卢梭的人性论,康德进一步认为,人是自然物,更是人造物,教育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通过教育活动,将习得一种基于理性的道德能力,最终成为一个自由行动者。由此,康德肯定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的强制性优势,肯定非自愿的强制服从,它使得儿童为将来遵守公民的法做好准备,同时也认为,对儿童进行一定的训导是必要的,把外来的限制变成内部法则,这样儿童才算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从强制的持续培养中自由行动者凸显出教育的艰巨性,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培养自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尽早地让受教育者学会思考,使受教育者接受并习惯必要的强制。而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一过程,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

(王杰 辑)

默会知识对学校文化的构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东娇教授在《教育研究》2017年第9期发表《看见与听见:学校文化的意旨与言传——兼论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观及其启示》一文提出,从法国哲学家萨特到梅洛-庞蒂的研究证明,视觉与听觉、看见与听见是人类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把知识分为明述知识和默会知识,对于获得学校文化全景观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的相当大部分可以明述,而人际、技能、能力、传统等属于学校默会文化。学校明述文化建设应该运用标准化、简化策略,而默会文化建设需要走寓居、亲和与合法、边缘参与之路。研究者与学校密切合作进行学校文化建设,其共同目的是实现学校教育及其生活的成功。

(李孔文 辑)